

“习总书记帮了我们春光电器厂的大忙”——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对象：张新立（左），1957年3月生。1983年开办春光电器设备厂。1985年转成国家干部，历任正定县科协干部，电子元件分厂厂长、总厂副厂长等职。陆树棠（右），1948年生。1983年到春光电器设备厂工作。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7年4月15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张新立家中

采访组：张新立同志，您好！请您谈谈当年在正定筹办春光电器设备厂的起因。

张新立：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正定县广播站工作。那时我是个科技爱好者，平时喜欢钻研一些无线电技术，搞一些技术革新和改造。习总书记在正定时，经济环境、政策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人们思想更活跃了，县里也更支持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了。我因为在广播站一直转不成正式职工，干得也不是很顺心，后来就干脆出来，于1983年开办了春光电器厂。这个厂生产一些电器元件，同时也由我主导研制一种新型舞台灯光设备。这套设备在当时国内舞台灯光领域属于比较领先的产品，可以根据舞台音乐的变化自动识别音调，给舞台投放各种灯光色彩，渲染舞台氛围的效果很好。

1984年，我把这种设备研制成功了，在省科委立了项。那个时候，习总书记主政下的正定县，非常重视人才，重视科技成果，重视新产品研发，他本人对这个领域发生的事特别敏感。有位同志就把我们厂的事汇报给习总书记，他马上就到我们厂来视察，并且认认真真看了我们这套设备的演示效果。看过之后，他非常高兴，主动问我们厂有什么困难，还需要什么支持。从那次以后，习总书记多次来我们厂视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习总书记这几次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很低调，很接地气。我们看他穿的衣服，看他讲话时亲切随和的态度，觉得他就和我们老百姓一样。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们他是北京来的，而且在大机关里工作过，谁也不会想到这些。

后来，真正把产品推向市场，还真是多亏了习总书记亲自从北京帮我们找人，为产品打开了销路。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是如何帮你们打开销路的？

张新立：习总书记帮我给北京的文艺家活动中心一位同志打了电话，并且跟他打好了招呼，让他接待我。之后，他就安排我去北京。临行前，习总书记嘱咐我说：“新立，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你这次去北京找的那个

人，他跟文艺界的联系非常多。关键是，他和一些单位的舞台灯光设计人员很熟悉。通过他，可以把你们厂的产品推出去。”

我到北京以后，很顺利地联系上了那位同志。他在文艺家活动中心组织了一个“彩色灯光声控器研讨会”。当时，他把很多单位的灯光舞美师都请去了，我就在这个研讨会上给这些单位演示我们的产品，效果非常好。而且，那一年有一个很好的契机，建国35周年大庆就要到了，我们这个灯光设备对增强演出效果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后来，参加研讨会的单位，很多都订了我们这个产品。

那一年，在建国35周年大庆的很多舞台上，我们的产品发挥了很大作用，也得到了媒体的关注。人们议论说：“正定县的几个农民，在舞台灯光控制方面搞出了这么重大的发明，在国内首家推出这样的设备，真是了不起啊。”后来，为了鼓励我，习总书记还亲自给我颁发了一个自学成才奖。

但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怀疑和不理解。比如有两个北京的单位知道这个产品以后，打算采购，拿了产品说明书之后，就派人到我们厂来调研，他们看了我们简陋的厂房，觉得我们这种条件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好的产品。然后，他们又到深圳、上海转了一大圈，哪里都没有和我们类似的产品，后来还是回到正定，在我们厂采购。厂房看着简陋，但我们确实是国内第一个研制和生产声控灯光技术的厂家，从产品的电路、结构、外形到说明书全部出自我们自己的手。

当时我们的硬件、营销等方面根本没有实力，就是有这么一个产品。说实话，也多亏了习总书记花了很大力气帮助我们，我们的产品才能推向社会、发挥作用，工厂也得到了发展。

采访组：请问您是哪一年转为干部的？后来在岗位上又和习近平同志有什么交集？

张新立：1985年，我因为办厂的一些贡献和取得的一些成绩，转成了国家干部，到正定县科协工作。同时，我和陆树棠还一起办了一个业务员培训班。办这个培训班的初

衷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干部和群众对商品经济的知识还比较贫乏，培训班主要是帮助大家学习一些常识。后来，我们把培训课程汇编成了一套工具书，不是长篇大论地讲理论，而是搞成了一本比较通俗易懂的业务员培训手册。

为了增加教材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就和习总书记说：“能不能请于光远先生写个序？”习总书记说：“你们先给于光远的秘书打个电话，把书稿提供给他们。”我们没有联系上于光远先生。后来，习总书记又想办法再次帮助我们联系。因为种种原因，后来写序的事情没有办成。

采访组：1985年，习近平同志调到厦门工作。临行前，您去送他了吗？

张新立：是的。1985年，习总书记调到福建厦门工作。他走的那天早上，我到县委去，一敲他办公室的门，张银耀把门打开了一个小缝，对我说：“习总书记正在吃饭，等一会儿吧。”我刚要离开，正在吃饭的习总书记一抬头，从门缝里看到了我，就说：“新立，进来，进来！”

我进了屋，习总书记一边吃饭一边和我聊天，说了一会儿话。几分钟以后，习总书记吃完饭了，县里领导和县委办公室的一些同志也都来送他了。大家帮他把装书的箱子搬上车，跟他告别。

1987年，我去厦门找过他一次。头两天，习总书记去调研，我就在住处等他，到了第三天，习总书记回来了，抽出时间来见我。我跟他汇报了一下这两年工作的情况，又和他拉了拉家常。之后，我又在厦门待了两天。回来的时候，习总书记自己出钱给我买了机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一路上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非常兴奋。我还清楚记得，那张机票是210块钱。

习总书记后来到福州市任市委书记。我后来调到电子元件厂工作，李亚平是厂长，我是副厂长。那期间，李亚平到福州去看望习总书记。习总书记跟李亚平说：“你捎个信给张新立，请于光远先生给他编的书写序的那件

事，后来一直也没办好，我感到很抱歉。”

听到李亚平带来的这句话，我心里百感交集：如果习总书记不提，这件事情我早就忘了。这本就是一件小事，只能是随缘，能办得成就办，办不成也很正常。但习总书记把对我这个民间朋友的承诺看得如此之重，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一直记在心里，念念不忘。这是让我最感动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守信重诺，他把承诺放在心中，念念不忘。

张新立：确实如此。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可以诠释他的这种品格。

1985年春节，习总书记带着李亚平到东权城村来看望我和陆树棠。习总书记到我们家里来，一方面是表示对我们事业的支持和重视，给我们指示工作，一方面也是跟我们交朋友。习总书记鼓励我们，工作上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希望我们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那次，我跟习总书记谈心，也谈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路历程。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名无线电爱好者，在正定县广播系统干了几年，因为我是农业户口，身份一直转不过来，只能当合同工，也就是临时工。干活时我干在最前面，干得最多，最努力，但待遇跟正式工差很多。每逢年节，正式工都给发2斤红糖，我就没有，心里很不舒服。什么时候能转成国家正式职工，我咋也看不到头。

这些不公平待遇，都是因为我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差别。这个鸿沟在那个年代非常大。作为农民，更别提招干的事，一听是农民身份，就一票否决。后来，我办了春光电器设备厂，就不再说这碗饭了。

讲到这里，我有点激动，就跟习总书记说：“习总书记！将来，如果有一天能把户口这个界限给去掉就好了！”

习总书记微笑着朝我点点头，说：“嗯，这个要慢慢来。”

30多年过去了，那天年轻的习总书记朝我微笑和点头的情景，至今仍然牢牢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他那是表示赞同我的想法，重视我们农民的呼声。

2013年，习总书记当了国家主席。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个《意见》的发布，宣告中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那个时候，我虽然早已不是农业户口，并且转成了国家干部，但看到户籍制度改革的消息，我的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采访组：陆树棠同志，请您也讲讲当年和习近平同志的交往情况。

陆树棠：习总书记刚来正定县时，任县委副书记，我当时是东权城公社的文化站站长、电影放映员。习总书记来我们公社检查工

作，来前没通知，是直接来的。他到公社的时候，公社的干部正好下乡去了。习总书记和身边工作人员、司机还有几位公社的同志，几个人就站在院里的大养鱼池边聊天。

有一位同志说：“这养鱼池的水也太浑了，你们怎么不把它弄清亮一点？”

我就解释说：“水太清了，缺乏养分也不好，不是有句古话是这么说的嘛——水至清则无鱼。”

习总书记笑着接了下半句：“人至察则无徒。”

这就是我和习总书记的第一次见面。那时候我就觉得，习总书记是个很有文化底蕴的人。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写诗歌、杂文之类，所以对有文化的人感到特别亲切，也特别敬重。后来我才知道，对上这句格言对习总书记来说不算什么，他的文化比我可要高得多了。

采访组：您是通过什么事情了解到习近平同志的文化素养的？

陆树棠：我担任春光电器厂副厂长期间，记得一次有机会听习总书记谈到俄国文学。谈到俄国文学，大家自然就会提到托尔斯泰。

习总书记说：“哪个托尔斯泰？”

听他这么一问，我愣了一下，心里想，习总书记这么有学问，难道不知道托尔斯泰的大名？

习总书记接着说：“俄国有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列夫·托尔斯泰，写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我读过。还有一个是阿·托尔斯泰，他是剧作家和诗人。”

和习总书记的交流，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浅薄，这些我都没听说过，习总书记都已经读过了，最后弄得我有点不敢说话了。“知耻而后勇”，受习总书记的影响，我认真读了诸子百家、史学、哲学、经济学著作和一些外国文学。

采访组：1983年，您到春光电器设备厂工作，从那以后习近平同志也几次来厂里调研，您有没有见过他？

陆树棠：见过。习总书记到我们厂来视察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他和我们一起吃厂里食堂的馒头、家常饭，吃完还交了饭费。

不久之后，习总书记帮我们厂把产品推广到北京的很多文艺团体。他可帮了我们的大忙，可以说，没有他的帮助，我们这个厂子、这个产品以后是个什么结果，就很难说了。再好的发明，如果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采购，也是白费。

习总书记这个人很有“长性”，他不像有些领导，到厂子转一圈，听听汇报，就完成任务了。习总书记不仅来我们厂里几次，帮助我们，指导我们，而且一直关注和关心着我们厂子的发展。这样的领导，这样认真做工作，我们群众对他就是一个字——服！

坚持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与时俱进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建设“新十六字方针”，既涵盖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法治建设的主要环节，又明确了每个环节的重点要求，形成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蓝图总方向总抓手，对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作出了新部署、提出了新任务，要求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草案，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完善国家主席任期任职制度，明确国家监察机关的宪法地位等，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宪法，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范，体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反映了党心军心民心所向，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

远历史意义。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根本宪法保障。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要切实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真正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运用宪法、维护宪法。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当前，全面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军号角已经吹响。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深沉的使命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担当，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任牢牢扛在肩上，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披荆斩棘、雷厉风行抓督察抓落实，为全党上下树立了光辉典范。我们一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履职尽责、埋头苦干，奋力把建设法治中国的宏图伟业加快推向前进。

（上接1版）

坚持牢牢把握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总目标的提出，既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举旗定向、纲举目张的重大意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重大创新和重大贡献，充分说明我们党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推动都更具科学性、更富规律性、更有创造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有机整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骨干工程。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目前，我国共制定法律250多部、行政法规700多部、地方性法规9000多部、行政规章11000多部，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还需要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进一步完善。要紧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统筹抓好“一个共同推进”和“一个一体建设”，鲜明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思路和新布局。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三者本质一致、目标一体、成效相关，必须相互统一、共同推进、形成合力。依法治国要求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党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各级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求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依法行政是各级政府活动的基本准则，要求各级政府必须依法全面履行职能，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辅相成。其中，法治国家是法治建设的目标，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的主体，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的基础，三者共同构成全面依法治国的三根支柱，缺少任何一个方面，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布局就不完整，总目标就无法实现。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这就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三者同步规划、同步实施，推动三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